

# 西夏瓷器产生的社会环境及组织形态探究

赵 龙

(新疆艺术学院文化艺术学院,924301087@QQ.com)

**摘 要:**西夏瓷器作为西夏时期遗存的典型手工技艺的代表,研究和探讨其产生的社会环境和组织形态,对于全面了解西夏的历史具有积极意义。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和考古资料发现,西夏丰富的制瓷原料、便利的交通和外地技术人员的迁入是西夏瓷器产生的重要条件,西夏瓷器的生产借鉴了中原及相邻地区的生产工艺,瓷器的类型和标识等反映出西夏瓷器的生产具有比较规范的行业组织形态。

**关键词:**西夏瓷器;社会性;组织形态

基于传统研究视角对瓷器的相关研究,大多倾向于从瓷器的制作工艺、纹样装饰及其文化内涵等层面来考量瓷器作为工艺形态的内涵渊源。以个体或者单向的维度来理解瓷器在生产和流布过程中附带的审美意义和文化传播,并不能完整地还原一个瓷器在当时社会生产、生活中的重要意义,须从单纯的形式维度扩展至人口、经济、文化、交流等层面,将瓷器作为一个文化整体进行解构,才能将其中所包含的社会性更加真实地显现出来。正如方李莉在《景德镇民窑》中谈到的:“旧史学孤立地强调上层阶级的意识形态、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即我们现在所说的政治史,新一代历史学家则不然,他们还注意到其他的科学门类——地理学、经济学、人口统计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 and 心理学等,从中获得启迪和灵感……包括气候时令、科学技术、人口变迁、日常生活和物质文化等等。”<sup>[1]</sup>

从作为瓷器文化整体的社会现象来考量和

研究瓷器生产的全过程,能更加详尽地了解瓷器发生、交流及使用的全部驱动力。将西夏瓷器置于整个社会大背景下,探究瓷器制作所依存的交通、人口、贸易、矿产等因素及其对西夏瓷器产生、发展的影响,对于全面了解西夏历史具有积极意义。

## 1 西夏瓷器产生的社会环境

瓷器制造业的发展和其所处的外部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考察一个地区的瓷器生产制作,首先要考察该地区是否具备瓷器生产所需要的客观基础条件。西夏尽管地处较为偏远的西北内陆,但发达的交通和丰富的制瓷原料为西夏的制瓷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 1.1 交通

丝绸之路出新疆地区分南、中、北三条道路,但丝绸之路从长安出发在宁夏境内也分出了南道和北道两条运输线路。其中,南道起于长安,

[收稿日期]2024-12-27

经天水,过临洮、河州、永靖、西宁、扁都口到张掖城,会经过西夏重要的统治区域——河西地带。而北道则是直接穿过西夏故地的腹地,连通长安与武威和张掖,所不同的是,北道之中又分出了南北两条线路。

南线路从长安出发,经固原、海原、靖远、景泰、武威到张掖,需要翻越高山大川,道路十分险峻。同时,该线路处于不同势力的交界带,战乱频繁,在唐末的安史之乱后,吐蕃占领了固原,这条通道逐渐衰落。随之而兴的是从长安出发,经平坦的清水河谷地,经灵武、银川、青铜峡、中卫到武威、张掖的北线路,也有经银川越过贺兰山到达张掖的路线。在途经西夏故地的北线路中,西夏故地的几个重要城市都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而存在,如固原、海原、银川、灵武、青铜峡、中卫、贺兰山等。尤以固原为代表,如固原博物馆藏希腊神话风格的鎏金执壶、萨珊波斯金币、罗马帝国金币等,这些都是远在万里之外的西方世界器物的代表,证明丝绸之路曾在这里留下印记。

灵武窑的所在地灵武,古称灵州,除了丝绸之路将灵州作为重要的商贸节点之外,唐代的“参天可汗道”也将灵州作为重要的通道节点城市。唐代建立之后,为了漠北诸部落朝贡的便利,开通了从北庭经回鹘牙帐、灵州、庆州到达长安的道路,因唐时诸部族尊称唐太宗为“天可汗”因此这条朝贡的道路也被称为“参天可汗道”<sup>[2]</sup>。

灵州道在唐代一直持续发挥着重要作用。唐末五代时期,原州陷落,萧关道被阻隔,灵州道成为了通往长安的重要路段,在《宋史》的记载中,灵州成为西通高昌至西域的重要节点,西域各个使节也经此到达汴梁<sup>[3]</sup><sup>[4]</sup><sup>[11]</sup>。西夏立国之前,为了发展与契丹之间的关系,同时也为部署自己的军事战略,自其统治中心的兴庆府至辽国

上京开辟了直路。《辽史·地理志》称:“河清军,西夏归辽,开直路以趋上京。”<sup>[4]</sup><sup>[5]</sup><sup>[15]</sup>《西夏书事》载:“自李氏归顺契丹,使介往来,特开迳路以趋上京。”<sup>[5]</sup><sup>[4]</sup><sup>[29]</sup>直路的开辟,一方面解决了西夏与辽之间的战略结盟,另一方面为西夏与辽之间的贡赐、贸易提供了客观便利,同时也方便了西夏对边境地区的军事管控。

西夏立国后利用“直路”干道及其支道构建了四通八达的全国道路网<sup>[2]</sup>,这些道路不仅强化了统治区域的权力存在,更为西夏发展本国经济及手工业成品的流通和转运提供了基础设施。磁窑堡、插旗沟、回民巷、塔尔湾等西夏的主要瓷器生产地,都通过便利的交通串联在一起。

西夏的交通网络也成为瓷器外销的商路通道,有学者认为草原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也通过西夏的交通网络连接起来。如卫月望认为,吐蕃人假道西夏向契丹朝贡,遂形成了一条草原丝绸之路——西南路,从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出发,经南京(今北京)、西京(今山西大同市)、夏国,直抵逻些城,翻越喜马拉雅山即至今孟加拉湾,与海上丝绸之路接通<sup>[6]</sup>。尽管从实际意义上这条沟通草原与海上丝路的通途实现有着诸多的困难,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西夏的交通地位以及其作为商贸中转的优势条件。

除了陆路交通之外,西夏境内,黄河水道贯穿其境,从水陆交通的通达性而言,方便了瓷器生产中原材料的转运和产品的运输。《辽史·萧蒲奴传》记载,重熙十五年(1046年),辽兴宗征西夏,西南招讨使萧蒲奴“以兵二千据河桥,聚巨舰数十艘,仍作大钩,人莫测。战之日,布舟于河,绵亘三十余里。遣人伺上流,有浮物辄取之。”<sup>[4]</sup><sup>[13]</sup><sup>[35]</sup>辽军进攻西夏皆动用水师,粮秣辎重全靠河道运输,足见当时黄河水量之大与河床之深。水运交通的发

达反映在民用上便是成为促进贸易沟通的重要通道,为沟通境内外贸易的发展提供了较为多样的运输途径。

## 1.2 贸易

贸易的发展是促进瓷器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建立在便捷交通下的贸易往来,除了实现沟通有无的功能之外,更是考察一个区域生产生活状况的重要依据。考古视野下,瓷器生产制造业的出现和繁荣,在人类学的视角表现为一种群体性行为,这种群体性行为是必然的、紧贴社会现实的,是通过与社会生活状况的深刻关联而实现的。从贸易环节考察西夏瓷器产生发展的条件及基础,能够从侧面反映出瓷器生产的内部及外部的基础因素和变化条件。

西夏草原丝绸之路贸易的发达,很重要的一方面是国与国之间开展的外交活动中附带进行的官营贸易活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05中记载:“每一使至,赐予、贸易,无虑得绢五万余匹。归鬻之其民,匹五六千,民大悦。一使所获,率不下二十万缗……”<sup>[7]</sup>同时,宋夏之间的榷场往来也是西夏贸易的一种形式。景德四年(1007年),宋朝在保安军设置榷场,“以缯帛、罗绮易驼马、牛羊、玉、毡毯、甘草,以香药、瓷漆器、姜桂等物易蜜蜡、麝脐、毛褐、獐羚角、硃砂、柴胡、苻蓉、红花、翎毛,非官市者听与民交易……”<sup>[3]4563</sup>尽管其中涉及购买宋朝的瓷器,但从西夏瓷器的发展进程来看,属于西夏瓷器尚未大规模生产的早期。随着瓷器发展进程的深入,技术的进步,促使西夏瓷器在本民族政权内部有了流通的物质基础。

宋夏交好时,中原王朝与西域的往来关系也有所改善。《宋史·夏国传》有记载,西域各国“若天竺、于阗、回鹘、大食、高昌、龟兹、拂林等国,虽介辽、夏之间,筐篚亦至,屡勤馆人”<sup>[3]13981</sup>。

说明西夏的兴起并没有阻断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这些贸易往来促进了西夏瓷器发展,并为其提供了一定的技术支撑和参考。贸易的沟通从来不是单纯的商业往来活动,更多的是不同地区和族群的人在贸易活动沿线展开的一种文化上的交流与沟通。《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图1)的碑铭中生动地描述了凉州的交通情况:“武威当四冲地,车辙马迹,辐辑交会,日有千数。”这种体量的贸易往来势必要在交流中发生文化和技术的交流融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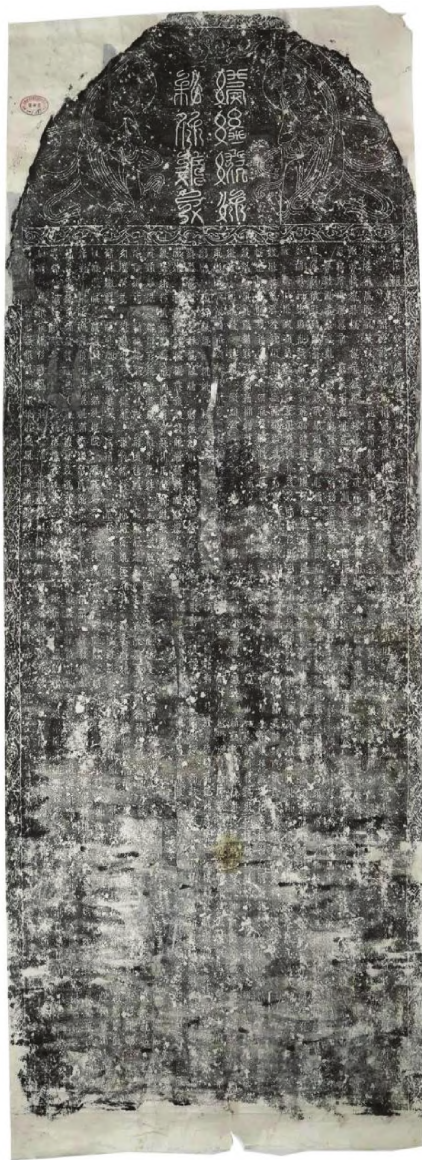


图1 《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

西夏统治者看到了丝路贸易的巨大经济利益,并出台了一系列贸易制度来更好地管理往来贸易。《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他国买卖门》载:“出使他国者往时,正副使、内侍、合门、官之卖者、驾骆驼、侍马等所属之私物,及诸人所卖官私物等,不许由官驼负之。”<sup>[8]568</sup>《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使来往门》又载:“他国来使,住于京师馆驿,依官买卖,未住诸人不许随意买卖。”<sup>[8]297</sup>

通过考察西夏境内贸易活动的发展状况,可以了解西夏当时社会生活状况,探析西夏瓷器在发展过程中的助推因素。发达的贸易交通线为西夏瓷器的生产、转运提供了较大的便利,同时,途经的丝路贸易及宋夏、夏辽、夏金之间的官方及民间贸易的存在,也为西夏瓷器制作技术的进步提供了交流便利。

### 1.3 人口与手工业

封建王朝时代,人口是社会基本的劳动能力保障,从物质生产的角度而言,人口是创造一切社会物质生产的基础,地区人口数量的变化可以反映该地区生产生活的社会状况。从手工业发展角度而言,人口既是手工业发展的劳动力保障,也是手工产品的使用对象;从生产销售的环节来看,人口市场的体量直接影响着本地区手工业的发展进步空间。考量西夏瓷器生产发展的影响因素,人口市场的大小和手工业发达程度也是必要条件之一。

根据杜建录的推断,西夏人口在30万户(帐)以上、160万口左右,上限不超过180万或200万口,下限不低于100万或120万口<sup>[9]</sup>。西夏的疆域面积大约有66万平方公里,我们按照160万的人口数量来估算,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约为2.4人。从地理环境来看,西夏境内的人员主要居住在河西及宁夏平原一带,大部分的荒

漠高山地区人员稀少,因此人口的密度会呈现出一个相对集中的状态。宁夏平原的兴庆府(银川)、灵州(灵武),河西一带的武威等地都是西夏的人口聚集区,而这些地方也都存有瓷器生产的窑场遗址,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瓷器生产与人口聚集区紧密相关。

但人口数量并非固定不变,作为一个从游牧民族成长起来的政权,对于人口的需求是十分迫切的。西夏的统治者为了增加国境之内的人口数量,除了自身的自然增殖之外,更多的是采用战争手段俘获劳动力。西夏军队中有专以俘掠人口为职责的“擒生”。西夏统治者曾用“脆怯无他伎者,迁河外耕作,或以守肃州”<sup>[3]14029</sup>。甘肃省武威市西郊林场发现的两座西夏墓题记中,就明确指出了两位墓主人的祖籍是彭城(今江苏徐州市)<sup>[10]</sup>。一定程度上佐证了西夏统治者对“无他伎者”利用的记载。

可见,西夏政权在战争中的主要职责除了单纯的对外扩张外,更多的是通过多途径的方式来提升本国的人口数量和质量,对于掌握手艺的俘虏而言,更是利用其优势来发展本国的手工业。

由于文献资料较少,通过现有文物资料考察研究西夏历史和手工业发展形态,只能获得局部的了解,将瓷器的生产发展放在整个时代和社会的大背景下来考察,可窥见西夏瓷器生产的起源及发展状况。

农业生产水平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依赖,能够很好地反映出西夏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西夏的统治范围主要位于今天的河西走廊及河套平原一带,有大片的良田。从考古资料来看,犁铧、犁镜、锄等西夏农具与中原当时的农具基本一致或十分相似,这是党项人在农业生产的过程中学习宋代农业技术的结果显

现。“耕稼之事,略与汉同”<sup>[5]419</sup>,说明西夏境内的农业生产水平并不低。“国人赖以生者,河南膏腴之地”<sup>[5]517</sup>,兴、灵二州是西夏的粮食主产区。

西夏版图内的汉族人口分布较多,东部的黄河两岸、无定河流域和河西走廊为三大聚居地区,主要以农业、手工业、经商为主<sup>[11]</sup>。从汉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说,据杜建录推断,“汉族人口约占西夏总人口的20%左右。”<sup>[12]</sup>这一时期移入的人口和河西原有的汉族人口都有较大的增长,为西夏河西地区的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贺兰山苏峪口瓷窑遗址发现的釉封匣钵口的烧装方法<sup>[13]</sup>,是首次在浙江上林湖以外的地区发现,证实了这种人口和技术的迁移。

此外,战争导致人口和工匠的被动迁移也是西夏瓷器发展壮大的重要因素。元灭宋后,也曾在江南搜罗十万余户工匠:“伯颜帅师伐宋……籍江南民为工匠凡三十万户,惠选有艺业者仅十余万户,余悉奏还为民。”<sup>[14]</sup>西夏作为地处西北的民族政权,想要迅速发展本国的制瓷技术,依赖外来工匠也是快速提升生产能力的途径之一。嘉祐七年(1062年),夏毅宗谅祚曾派遣使臣向宋朝廷乞取国子监所印书、释氏经、译经僧、幞头、工人、伶官等,宋朝皇帝拒绝了赐予译经僧、工人、伶官的请求<sup>[15]</sup>。而乞求的这些“工人”就有可能成为制瓷人。宁夏磁窑堡的发掘研究显示,磁窑堡瓷器技术的发展是一个借鉴相邻地区瓷器生产技术的过程,这一点从西夏瓷器所使用的开光装饰方法可以看出,显然是受到了磁州窑系的影响<sup>[16]</sup>。

在政府的管理体制上,西夏统治者也为促进手工业的发展制定了专门的掌管机构和生产准

则。《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司序行文门》中记载了明确设立的工院有刻字司、作房司、织绢司、作首饰院、铁工院、木工院、织工院、砖瓦院、出车院等<sup>[8]264</sup>。又记载曰:“三种工院:北院、南院、肃州。”<sup>[8]363</sup>其中,肃州工院就是专门管理河西地区的手工匠作行业的管理机构。据史金波分析,甘州地区也应有边工院且至少有两个下等司机构:甘州城司、北院边工院;北院工院也为下等司,派一正、一副、二承旨等四人<sup>[8]370</sup>。在生产法则上,西夏统治者对于瓷器的生产制作也有着较为明确的规定。《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物离库门》明确规定:“陶器皿因损,百中可耗减十。”<sup>[8]549</sup>这样就从管理机制上实现了各个区域的手工业的管理和消耗的准则。

从有关西夏手工业的研究资料<sup>[17-18]</sup>来看,西夏的手工业生产存在着官方经营和民间经营的状况,其中官营手工业带有一定的特殊性,其产品的主要供给对象是皇室贵族等阶层,而民间经营的窑口主要销售对象是普通大众。西夏瓷器窑口中,新发现的苏峪口最符合官窑性质,而灵武窑则二者兼具。西夏管理机构将工匠划分为官人匠和民间匠,官人匠是因为世代传习、罪犯转变、战争俘虏、掠夺等方式获得,而民间匠则是民间的个体工匠<sup>[19]</sup>。西夏《凉州护国寺感通塔碑》结尾处不仅列有书写碑文及监修官员的姓名,还列有工匠姓名,说明西夏有一技之长的手工生产者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 1.4 矿产

从西夏瓷器生产技术的发展情况可以看出,西夏与中原有着密切的技术交流和文化往来,但是社会条件的成熟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制瓷业发展的物质条件。西夏窑址的产生有着客观的原因。

以煤炭为例,宁夏煤炭资源分布广,储量丰富,品种齐全,煤质优良,埋藏较浅,水文地质条件简单,便于开采,大约在北宋、西夏时期就有煤窑<sup>[20]</sup>。以灵武为例,其煤炭资源丰富,已探明储量273亿吨,占宁夏探明储量的80%以上<sup>[21]</sup>。煤系露头处的高岭石质泥岩可以用作制瓷原料。史料中关于灵武窑烧造瓷器所用的原料的使用与开发虽然仅有零星记载,但也直接反映了西夏瓷器的发展是建立在丰富的矿产基础之上的。明代胡汝砺撰、管律重修,2013年出版的《嘉靖宁夏新志》中提及:“磁窑山,州东北六十里,为陶冶之所。”<sup>[22]193</sup>磁窑寨,“城周回二百一十丈,南门一。旧有守御官一员,汉中卫备御官军一百二十员名。正德初,以其非要冲之地,徒事糜费,乃撤之。今止庆府窑匠军余四十余名,并各处陶器者十余人居焉”<sup>[22]202</sup>。虽然记载的时期与西夏时期相距甚远,但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西夏瓷器的发展壮大除了手工技术的支撑外,更多的是建立在丰富制瓷原料的基础上。

2021—2022年,贺兰山苏峪口西夏瓷窑址除发现了保存好、结构完整的古代制瓷作坊之外,窑场周边的山坡同步发现了瓷土矿、石英矿、石灰矿等诸多采矿遗迹<sup>[13]</sup>。从位置上来看,苏峪口遗址位于贺兰山煤矿带,这些瓷土矿和煤矿都是与瓷器生产直接相关的产品。同时,采矿坑与瓷窑遗址同步发现,在我国已发现的瓷窑遗址中较为少见。

## 2 西夏瓷器产生的组织形态

### 2.1 产品类型回溯组织形态

西夏瓷器的生产技术受到了中原等地瓷器制作技术的影响,但从瓷器的整体风格上来看,西夏瓷器形成并保持了西夏政权的风格特点和

要素。尽管关于西夏瓷器窑厂生产制作等诸多环节的资料较为缺乏且难以还原,但结合《宁夏灵武窑》<sup>[23]</sup>《西夏瓷器》<sup>[24]</sup>《宁夏灵武窑发掘报告》<sup>[25]</sup>等的研究内容和内蒙古、宁夏、甘肃等地的窖藏遗址遗迹发现,中原地区所见的瓷器类型,西夏瓷器基本都有涉及,主要包括饮食器(碗、盘、钵、杯、罐、瓮、壶、瓶、盏等)、宗教用品(炉、佛像、念珠、法器)、生产用品(瓷钩、瓷铃、纺轮等)、娱乐文房(砚台、砚滴、棋子、骰子、埙、腰鼓等)、建筑材料(板瓦、瓦当、迦陵频伽等)、军事用品(蒺藜、弹丸等)等。

生产范围将日常生活的吃穿住行全部囊括其中,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夏境内现实生活中对瓷器的依赖。并且,这种类型多样、需求量大的瓷器必然是需要数量较大的工匠同时配合生产。目前没有有效的资料来直接表明西夏瓷器的生产组织所包括的程序,但可以以成熟的生产形态作为参考,来估量西夏瓷器的生产组织模式。2021年面世的宁夏贺兰县苏峪口西夏瓷窑遗址中,在作坊区内,发现了辘轳坑、釉料缸、灰坑等遗址,这些遗址内生产遗迹十分明显,从遗址内的矿坑到生产区域,整个过程包含采矿、粉碎、贮存、拉坯、上釉、晾坯、烧成等一系列完整的制瓷工序<sup>[13]</sup>。从具体的生产环节来看,生产过程所需要的人员配置也是较大的。按照瓷器生产的工艺流程,仅仅做坯环节所需要的人员就包含了挑坯工、装坯工、做坯工(其中又细分为做坯工、印坯工、利坯工、挖坯工、刹合坯工、打杂工)、画坯工(又细分为画坯工和混水工)等,每一个生产环节背后都是一个完整的生产系统,各自相互配合,同时加上燃料原料的运输及生产销售环节,人员的数量就更大。由此可见西夏瓷窑生产所需的人员数量规模庞大。

同时,从窑口附近的遗存来看,也能较为准确地反映出那个时期西夏瓷器生产的规模。灵武窑窑址南北长约 800 米,东西宽约 400 米,在遗址附近的文化层堆积层最薄处 2 米、最厚处 4 米<sup>[26]</sup>。相距数公里外的回民巷窑瓷片遗址,在东西长约 400 米、南北宽约 200 米的范围内,散落着大量的瓷片<sup>[27]</sup>。此外,2020 年苏峪口遗址发掘中,清理出 13 座窑炉、面积近 4 万平方米的烧造遗址,出土瓷片 47 万片之多,烧装窑具达到 2.4 余万个,还有附近一起出土的烧窑所需的瓷土、石英、煤炭等原料及燃料矿坑遗址<sup>[13]</sup>,这些制作工序,加之同步开展所需要的采矿和采煤工人的配合,所需人力数目庞大,且必须组织建立起程序规范、流程合理的组织体系,才能保证生产的有序进行。

## 2.2 产品标识对组织形态的反映

基于文献资料较为缺乏的情况,从组织形态去考察西夏瓷器窑口的生产状况,可以大致还原出其组织形态和生产规模,但要更进一步地分析西夏瓷器生产的社会状况,构建起西夏瓷的组织形态,还必须从生产的最终形态——产品上着手,进行深入的考察和研究。对产品的考察和研究,一方面可以有效地反映当时社会生产生活状况的要素,另一方面可以反映当时瓷器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状况。

灵武回民巷窑采集的瓷片中有“东平王衙下”(图 2)、“三司”等字样,苏峪口瓷窑遗址中发现有“官”字款匣钵(图 3)、“东平王”和“三司”都属于西夏统治的政权机构。由此可以推断,西夏地区官府用瓷和民间用瓷呈现出不同的生产形态和工艺流程,所需的人力资源呈现出差异化。

在出土的瓷片中,有大量具有民间用瓷属性的铭文。如目前可确认的单字有“陈”“李”“唐”



图 2 “东平王衙下”瓷片



图 3 “官”字款匣钵

“杨”“兴”“也”“记”“义”“院”“圣”“相”“五”“香”“十”“风”等(图 4),双字有“年四”“王孟”“有馆”“李五”等,三个字及以上的有“谢南朝”“焦宏宗”“卢吕三”“天下夫”等(图 5)。

此外,还有带有显性生产信息的铭文。如“税僧”(图 6)、“三十吊五十串”(图 7)、“赵家罗”“泾州西街巷张张税”“二十七”“三月二十日”“光定四年四月卅日郭善狗家瓮”(图 8)、“斜毁发酵有伤下速斜小”“第五号瓷瓮”等。



图4 含有单字信息的瓷片



图5 含有多字信息的瓷片

从西夏瓷片上可见的单字及姓名铭文来看, 这些信息的刻写应该为当时订件人所定制的货物, 制作者在生产过程中为了区分而留下的标记。从这些字表现出的信息来看, 订件人的身份和职业分布较广, 生产基数较大, 一定程度上反



图6 “税僧”瓷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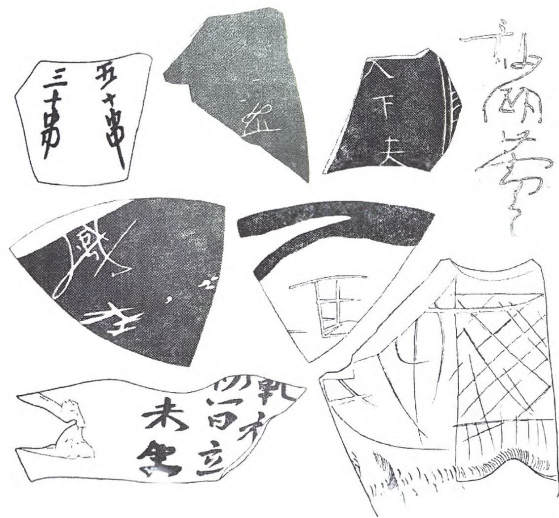


图7 “三十吊五十串”等瓷片

映出西夏瓷器拥有完善的生产模式和兴盛的生产状况。

而那些较为显著的信息, 则能够更加清晰地反映出西夏瓷器生产的数量、具体的要求、销售环节等信息。如“税僧”显示出瓷窑的生产与寺院的直接关系。西夏陶瓷的生产中有大量的产品是与佛教寺院息息相关的。如目前可见的瓷塑金刚力士(图9)、金刚杵、如意轮(图10)、擦擦、念珠、迦陵频伽等。“三十吊五十串”“二十七”则可能显示出同类型瓷器或者同一批次的瓷器依据订货人的需求所要生产的具体数量。“泾州西街巷张张税”“光定四年四月卅日郭善狗



图8 “光定四年四月卅日郭善狗家瓮”瓷片



图9 瓷塑金刚力士



图10 金刚杵、如意轮

家瓮”(泾州指今天甘肃泾川县,光定四年四月三十日是指1214年西夏神宗李遵顼统治时期)则直接表明了具体生产时间和订件人的姓名、详细地址和器物类型。“斜毁发酵有伤下速斜小”“第五号瓷瓮”等信息则显示,西夏的瓷器生产既有数量的叠加又有质量上的把控,对于不合格的产品,需要标示出具体的问题所在,并表明最终的处理结果。同时,“第五号瓷瓮”则表明西夏的瓷器生产按照不同的器型类别进行严格的管理,这也深刻地显示出西夏的瓷器生产已经有了较为严格的生产销售规范,不仅对各类器物的型号大小有编码,更是对损坏或者失败的器物有了明确的销毁规范,证明西夏瓷器的生产有了较规范的组织形态。

### 3 结束语

瓷器的生产制作属于手工技艺的行列,作为物质实体的西夏瓷器,深刻反映了西夏社会的生产生活状况。西夏瓷器的实物个体虽然能够表述出社会历史信息,但想要进一步还原生产环节的信息要素,必须将西夏瓷器放在历史的时空中去研究,进一步还原它的生产要素和制作、流通过程,对历史研究有效还原,也是对考察西夏瓷器生产文化信息的有效追溯和还原。

通过对西夏社会环境及资源分布等情况的分析发现:第一,西夏瓷器的产生、发展得益于本地丰富的矿产资源和便利的交通,他们共同助推了西夏瓷器的发展,并为其生产和销售提供了条件保障;第二,西夏瓷器的生产是借鉴了中原及相邻地区的生产工艺,且在生产过程中有外地技术工人的加入;第三,西夏瓷器的生产有着完整的技术和工艺形态,从灵武窑到回民巷再到武威、苏峪口,出土的瓷器、文字等信息都表明西夏

瓷器生产在原料获取、器物制作、生产销售、生产损耗、数量统计等方面都有比较规范的组织形态。

### 参考文献

- [1]方李莉.景德镇民窑[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22:5.
- [2]保宏彪.隋唐时期西北民族关系视野下的灵州与参天可汗道[J].西夏研究,2015(1):86-91.
- [3]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4]脱脱.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5]吴广成.西夏书事[M]//《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续修四库全书:334 史部 别史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 [6]卫月望.契丹外交与草原丝绸之路及货币[J].内蒙古金融研究,2003(增刊2):214-218.
- [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4:9863.
- [8]史金波,聂鸿音,白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 [9]杜建录.论西夏的人口[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1):35-37.
- [10]郭祥.武威考古研究文集[M].兰州:读者出版社,2023:675.
- [11]龚荫.中国民族政策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443.
- [12]杜建录.西夏经济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96.
- [13]朱存世,柴平平,郑建民,等.宁夏贺兰县苏峪口西夏瓷窑址[J].考古,2023(7):79-98.
- [14]宋濂.元史:卷221[M].北京:中华书局,1976:3924.
- [15]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九[M].解梁书院本.
- [16]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宁夏灵武窑发掘报告[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182.
- [17]王丽娜.西夏、元时期河西走廊手工业行业组织流变考[J].美术大观,2019(3):80-82.
- [18]景永时.论西夏的官手工业[J].固原师专学报,2000(2):10-13,17.
- [19]杨浣.西夏工匠制度管窥[J].宁夏社会科学,2003(4):60-64.
- [20]宁夏科技志编审委员会.宁夏科技志[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211.
- [21]董耀会.中国长城年鉴[M].北京:长城出版社,2006:25.
- [22]胡汝砺.嘉靖宁夏新志[M].管律,重修.陈明猷,校勘.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
- [23]马文宽.宁夏灵武窑[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8.
- [24]杭天.西夏瓷器[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
- [25]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宁夏灵武窑发掘报告[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
- [26]马文宽.宁夏灵武县磁窑堡瓷窑址调查[J].考古,1986(1):51-55,103.
- [27]杨焕新,马文宽.宁夏灵武县回民巷瓷窑址调查[J].考古,1991(3):224-226,292.

(责任编辑:朱艳红)